

# 以色列对非外交漫谈

杨曼苏

**【内容提要】** 以色列与非洲的关系经历过严重的波折,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收获。以色列以罕见的耐心,坚强的毅力,并辅以不断加温的秘密外交手段,来推行它的对非外交,终于取得了重返非洲的成果。

**【关键词】** 以色列 非洲 外交关系

**【作者简介】** 杨曼苏,1948年生,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近期主编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通信地址:同工作单位;邮编:650091。

以色列最初把眼睛盯在亚洲身上,这是因为它也是个亚洲国家,想在那里先打开局面。不料,它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会议上碰了壁,被迫把视线转向非洲。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非洲距以色列较近,开展外交和进行援建都很方便;二是非洲有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里拥有的投票权是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双方发展关系的根基不错。阿拉伯人在非洲的影响有限,非洲人对犹太人没什么恶感,这构成了它们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多次表示愿意结交非洲朋友,乐于向它们提供援助,这是贫穷落后的非洲人最爱听的一句话。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西方国家这样表态,许多国家与非洲国家还有段不愉快的殖民史。而以色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是1948年才独立的新国家,而且犹太人也有段受压迫的苦难史,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接下来的问题是金钱。非洲国家很现实,光耍嘴皮子不掏钱不行,而刚独立的以色列手中没钱。好在欧美国家愿意填上这个“亏空”,它们全力支持以色列这样做,不愿看到苏联人在非洲四处得手。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以赔款和贷款的形式给了以色列56亿美元,并同意以色列把其中一部分钱用于援非项目,这帮了以色列的大忙。法国也没有忘记它的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尼

日尔和中非等法语国家,支持以色列在这些前法属殖民地开展活动。美国自然不甘落后,它以情报合作方式向以色列提供了数千万美元巨资,让以色列为它开拓在非洲的活动空间。<sup>1</sup>

此外,以色列独特的经济模式也对非洲人产生了吸引力,一些非洲国家为之倾倒,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橱窗”。近30年中,有14500名第三世界国家学生在以色列受训,其中有一半是非洲学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以色列先后向40个非洲国家派出了3000名专家援助当地建设,在28个非洲国家中实施了67个项目。<sup>④</sup>非洲国家也以友好姿态做出回报,在国际社会中帮以色列讲了不少好话,支持它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在1961年联大会议上,非洲及拉美的16个国家与以色列一道提出一项提案,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并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双方的争端。这个提案虽然未获通过,以色列仍倍受鼓舞,因为它不再感到孤单。

1956年,以色列在非洲打响了第一炮——与加纳建立外交关系,次年又与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建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都是独特的非

<sup>1</sup> 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461页;以色列新闻中心:《以色列概况》,1995年中文版,第274页。

洲国家,以色列跟它们建交没费多少周折。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是海尔·塞拉西一世,这位传奇式老皇帝对以色列相当友好,一是他的国家也有亡国的经历,二是他的国内有大量犹太臣民——“法拉沙”。利比里亚被视为是美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它的公民中有大量的美国移民后裔——从美国返乡的黑奴,国内流行着美式英语和习俗,受美国的影响很深。

60年代,以色列加大了援助非洲的力度,对非外交也取得了大丰收。1960年,以色列与刚果、尼日利亚和象牙海岸等国建交,次年又与坦桑尼亚建交,到1967年它与41个非洲国家中的33个建了交,以非外交进入黄金时代。<sup>1</sup>以色列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与全部非洲国家建交,因为剩下的8个未建交国家有6个是阿拉伯国家。

尽管如此,以对非外交的成果要比对拉美外交的成果差一些。主要原因是以非外交始终摆脱不了阿以争端的影响。以非关系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开始降温。在1967年前,由于当时巴勒斯坦问题还不那么突出,所以以色列在非洲的日子还算过得去。1967年战争后,许多非洲国家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看法,认为以色列是个蛮不讲理的国家,根本不想与阿拉伯人讲和。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加深了它们的这种看法,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居然打到非洲来了,许多非洲人感到疑虑和害怕。这时,国际社会刮起一股把以色列逐出国际大家庭的狂潮,与以色列断交成为很时兴的做法,许多非洲国家几乎在一夜间跟以色列断了交,一些没与它断交的国家也躲得远远的。到1973年,以色列只跟莱索托、马拉维和斯威士兰等无足轻重的小国保持着外交关系。<sup>④</sup>

其中某些国家的断交行动颇具戏剧性。直到70年代初还同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的乌干达,在1973年战争之前突然与以色列断了交。战争爆发后,乌干达总统阿明立刻飞抵大马士革,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乌干达的军队将站在阿拉伯人一边战斗!”不仅如此,阿明还致电尼日利亚国家元首说,“我奉劝你立刻下令驱逐以色列大使出境!”尼日利亚立即照办,接着一大批非洲国家也跟以色列断了交。阿明甚至扬言要派300万志愿军去埃及抗击以色列人。好在萨达特总统谢绝了他的“好意”。<sup>(四)</sup>

阿明以前在以色列受过伞兵训练,跟达扬等高级将领私交甚密,与以色列人保持过一段友好关系。但此人说翻脸就翻脸,他后来深信以色列是非洲的敌人,力主把以色列人从非洲大陆上赶出去。断交后他对被驱逐的以色列顾问说:“特拉维夫政府蓄意毒化尼罗河并杀害我们乌干达人、苏丹人和埃及人。我蒙真主之助粉碎了这个阴谋,我们穆斯林必须站在一起反对这个凶恶的敌人。”<sup>1/4</sup> 身躯肥大的阿明性格暴虐,他的思绪和举止令人难以捉摸,但他对非洲领导人的影响很大,有10个非洲国家跟着他驱逐了以色列大使。

从1967年战争起,埃及就不断呼吁公正、和平地解决阿以争端,强调是以色列侵占了埃及领土,而不是相反。这一招很高明,它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相信阿拉伯人只想收复自己的失地,并不构成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尼日利亚在1973年战争末期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理由是:“以色列侵占了埃及的领土,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尼日利亚必须重新考虑它与以色列的关系。”尼日利亚是与以色列断交的第17个非洲国家,在它之后,加纳和塞内加尔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以军踏上苏伊士运河西岸一事对非洲人刺激极大,原先事不关己的阿以冲突突然间变成了摸得着看得见的以非冲突,非洲人一下子警觉地睁大了眼睛。塞内加尔元首桑戈尔在巴黎对以色列驻法大使说:“如果你们的国家强占苏伊士运河西岸,赖在非洲大陆不走,我们非洲人就是你们的敌人。”<sup>1/2</sup> 使以色列领导人最伤心的是,它在非洲最亲密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也与自己断了交,而埃塞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以色列在东非的桥头堡。当然,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的雄厚财力,非统组织多年来有效的工作,也对这种“雪崩”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色列后来之所以迅速从埃及的非洲部分撤兵,除了有美国大力施压的原因外,也有竭力避免刺激非洲人的考虑。

1973年战争打响后,除美国外没一个国家出

<sup>1</sup> 徐向群、余崇健主编:前引书,第461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461页;以色列新闻中心:前引书,第274页。

<sup>(四)</sup> [联邦德国]康策尔曼:《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76页。

<sup>1/4</sup> 同上书,第74页。

<sup>1/2</sup> 同上书,第76页。

来为以色列讲句公道话,尽管事实证明是阿拉伯人先动的手。但人们并不重视这点,他们认为被侵略者有反击侵略者的权力。在联大的激烈辩论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一个声调地斥责以色列,谴责它践踏了基本人权和安理会决议,无理霸占着阿拉伯人的土地。

不过,断交和谴责并未影响以非之间私下合作,相反这种秘密合作还有扩大之势。因为非洲国家是很讲究实惠的,它们不愿意推开以色列暗中伸来的友好的手,只不过双方都不愿意公开宣扬这种合作而已。双方外交关系虽然断绝了,但商业联系并未中断,非洲学生还领着以色列的津贴。而且非洲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1976年6月27日,一伙国际恐怖分子劫持了法航上的近百名以色列人质飞到乌干达,震惊了全世界。随后,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国防部长佩雷斯策划了极为大胆的“大力神计划”来营救这批人质。以色列与乌干达的来回距离有8000公里,要想救人质先要找一个愿意为以色列飞机加油的非洲国家。在1973年战争之后,整个非洲大陆跟以色列划清了界限,看不出哪个国家愿意这样做。但是,拉宾后来还是实施了计划,毅然派出了突击队前去救人,并且最终获得成功。

那么,是哪个国家帮助了以色列?答案是肯尼亚。以色列和肯尼亚的关系说来话长。早在肯尼亚独立前,以色列就一直暗中支持肯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后来成为肯总统的莫伊达成过一项“君子协议”——以色列负责训练肯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武装;联邦德国负责向这个组织提供武器弹药;肯尼亚日后对以色列、联邦德国的友好支持给予回报。尽管这只是个口头协议,谁也没有签字画押,但以、德两国都认真执行了。现在肯尼亚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允许以色列飞机于往返途中在内罗毕机场加油,并同意以方在那里设立前敌指挥部和医治伤员。<sup>1</sup>

以色列与扎伊尔的关系也是这种秘密外交的一个范例。1973年战争后,许多非洲国家跟以色

列断了交,其中一些国家随大流地与以断交时显得有些勉强。以色列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迅速制定了重返非洲的策略——主动帮助这些国家解决它们最紧迫的问题,让它们的领导人觉得自己一刻也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来双方复交便成为迟早的问题,而且这些国家也会四处帮以色列说好话。这个策略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1981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举行了密谈并达成如下协议:以色列向扎伊尔提供资金、武器并训练军队,扎伊尔与以色列复交并在国际社会中为它说话。在这之后,沙龙还答应把受训的扎伊尔军队变成精锐的总统师,并答应利用以美特殊关系帮助扎伊尔取得更多的美援。当美国国会把援助扎伊尔计划削减了1000万美元之后,以色列马上自己掏腰包为它补上了800万美元。此举使蒙博托大为感动,遂于1982年与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以色列趁热打铁,用当年入侵黎巴嫩从巴解手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了蒙博托的总统师,这使蒙博托的统治更加巩固了。除了首都卫戍部队外,以色列还为蒙博托训练了其他主力部队,这当然也是做给其他非洲国家看的。以此为契机,以色列的秘密外交先后叩开了8个非洲国家的大门,以色列欣喜地称之为“重返非洲”。

以非关系整个局面的改观是在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之后,在这之前的冷战时期,以色列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闲得发慌,整天扳着手指头数有几个非洲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了。现在一切都翻转了过来。非洲各国的总统、总理、部长走马灯似地访问以色列,以色列礼宾司的官员们也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责任编辑:艾迪;责任校对:徐拓)

<sup>1</sup> 杨曼苏:《以色列总理拉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